

从满文档案观察乾隆年间 清朝与瓦罕部的交往

惠 男

【摘要】 乾隆二十四年(1759),随着新疆天山南路的大小和卓政权的覆灭,清朝逐渐与中亚的伊斯兰世界发生直接接触,相继促成中亚地区各政权的归附,清朝与瓦罕部的交往亦由此展开。本文利用清代军机处的满文录副奏折、寄信档等资料,不仅梳理了清朝和瓦罕朝贡关系的建立过程,还探究了乾隆年间在面对瓦罕的内部争斗,以及瓦罕与巴达克山、布鲁特诸部争端时清朝的应对策略,揭示了乾隆时期清朝在面对中亚事务时秉持的“有限介入”原则。

【关键词】 瓦罕;中亚;藩属体系;巴达克山;布鲁特

【中图分类号】 K2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24)01-0042-12

【作者简介】 惠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研究员 100871

瓦罕(Wakhān)位于兴都库什山北部,西至喷赤河的伊什喀什姆(Ishkashem),与巴达克山相连,北至萨雷库里湖(Sir-i-kol),东到小帕米尔与瓦罕帕米尔在布才拱拜孜(Bozai Gumbaz)附近的分界处,这里是连接中亚和新疆的要地,历史上的瓦罕部或土邦曾经控制着如今“瓦罕走廊”的部分地带。^①

根据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的梳理,瓦罕在中原史籍中最早被称为“休密”,^②即《后汉书·西域传》中所言的“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朐顿、都密,凡五部翕侯”。^③北魏宋云和慧生的旅行记录将瓦罕所在的地区称作“钵和”。^④唐朝时期,瓦罕被官方记作“护密”或“护蜜”,^⑤《大唐西域记》则称其为“达摩悉铁帝国”(Dharmasthiti),^⑥另外在高宗显庆年间,“以地为鸟飞州,王沙钵罗颉利发为刺史”。^⑦在非汉文史料中亦有涉及瓦罕的记录,如10世纪的波斯文地理学著作《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提到:“什喀什姆(Sikāshim)是瓦罕(Wakhān)的城镇及首府,它的居民是异教徒和穆斯林,瓦罕的首领(malik)居住于此。”^⑧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行记称:“从巴达哈伤首途,骑行十二日,向东及东北溯一河流而上。此河流所经之地,隶属

① 关于瓦罕的地理位置,参考 Ludwig W. Adamec ed.,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Gazetteer of Afghanistan*, Vol. 1, *Badakhshan Province and Northeast Afghanistan*, Graz: Akademische Druck-u. Verlagsanst., 1972, p. 183; 张安、李春火:《18—19世纪瓦罕疆域范围考辨——与侯杨方教授商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1年第1期。张安:《瓦罕走廊与瓦罕帕米尔考辨》,《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② Aurel Stein,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Vol. 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1, pp. 60—66.

③ 《后汉书》卷88《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2921页。

④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页。

⑤ 张星娘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4卷,华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135—1139页。

⑥ 玄奘、辩机撰,季羨林校《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74—975页。

⑦ 《新唐书》卷221《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255页。

⑧ Vladimir Minorsky, *Hudūd al-ālam: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A Persian Geography, 372 A. H. — 982 A. 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21.

巴达哈伤君主之弟。境内有环以墙垣之城村,及散布各处之房屋不少。居民信奉摩诃末,勇于战斗。行此十二日毕,抵一大州,宽广皆有三日程,其名曰哇罕(Wakhan)。居民信奉摩诃末,自有其语言。善战斗,有一君主名日那奈(none),法兰西语犹言伯爵也。其人称藩于巴达哈伤君主。”^①瓦罕在13世纪左右已经是巴达克山的藩属。16世纪叶尔羌汗国历史学者米尔咱·海答儿的《拉失德史》(Tarikh-i-Rashidi)中,瓦罕(斡罕)被描述为“八答哈伤地区的边界”。^②

瓦罕与中国在18世纪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关系。乾隆二十四年(1759)随着天山南路大小和卓的覆灭,清朝逐渐与中亚的伊斯兰世界发生直接接触,相继促成浩罕、巴达克山、博洛尔、洪扎、什克南等国家或部落的投诚,清朝与瓦罕亦基于该背景而展开交聘。但是,清代汉文史籍中对这段历史记载极少,以致过去的论著难以勾画出18世纪中期真实的历史图景。^③

有鉴于此,本文将根据清代军机处的满文录副奏折、寄信档等资料,梳理乾隆年间清朝和瓦罕早期的朝贡关系建立的过程。除此以外,清朝在中亚构建的藩属关系显然在诸多方面皆明显迥异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特征,^④而具体到瓦罕这一特定案例中,这些特征都体现在哪些方面?清朝又将如何介入与瓦罕有关的各类中亚事务?本文将对此展开相应的探索。

一 清朝与瓦罕朝贡关系的建立过程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清军攻取南疆的政治中心叶尔羌和喀什噶尔,波罗尼都和霍集占和卓兄弟出逃。在综合多方面的情报后,清廷判断大小和卓逃往巴达克山方向,遂派大军继续进剿。七月初十日,清军追至伊西洱库尔淖尔,彻底击溃叛军,将大小和卓及其残众逼入巴达克山境内。清朝随即在中亚展开交涉活动:一方面分别于七月十四日、十八日向巴达克山派遣使者,要求其首领素勒坦沙(sultānša)移交大小和卓,另一方面则与巴达克山周边诸部落展开接触,在获取有关巴达克山及大小和卓情报的同时,接受这些部落归附,进而构建清朝在中亚地区的权力网络。^⑤

瓦罕很快因此进入清军的视野。八月二十一日,定边右副将军富德得知“除使者所行之两条路外,仍有一条通往巴达克山(badakšan)名为瓦罕(wahan)之路”,故富德等命令伯克霍集斯的属下回子巴拉特、厄鲁特三等待卫察里克齐兵等前去打探消息,“宣称将进军于瓦罕村(gašan)”。^⑥八月二十三日,瓦罕伯克米尔莽苏尔(mirmangsur)派遣其子苏勒坦(sultan)持归降表文,与巴达克山素勒坦沙之使者鄂穆尔拜共同抵至军前,苏勒坦禀称:

我瓦罕部落在巴达坎山东北边。总计有千余户,由我父米尔莽苏尔掌管。先前大军在阿

①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40页。

② 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二编),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8页。

③ 关于瓦罕与清朝关系的研究,参考Abdulmamad Iloliev,“The Mirdom of Wakhā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ownfall and Partition,”Cultural Heritage and Humanities Unit’s Research Paper 12,2021;侯杨方:《清代帕米尔西部、南部国界与什克南、瓦罕疆域范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3期;张安:《瓦罕走廊与瓦罕帕米尔考辨》,《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张安、李春火:《18—19世纪瓦罕疆域范围考辨——与侯杨方教授商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1年第1期等。另张安、屠静芬《清朝与瓦罕关系述略》(《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利用了部分满文档案,但仍有补充余地。

④ 参考Mark Mancall,“The Ch’ing Tribute System: An Interpretive Essay,”in John King Fairbank 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63—89;Takahiro Onuma,“The Qing Dynasty and Its Central Asian Neighbors,”*Sakaha: A Journal of Manchu Studies*,Vol.12,2014,pp.33—48;耿琦:《再论清朝对中亚宗藩体制的维系与巩固——以乾隆帝与外藩领主的私人关系为中心》,《清史研究》2016年第2期;贾建飞:《清朝对中亚诸部的政策探析——以1759—1864年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1期等。

⑤ 马子木:《乾隆朝初通巴达克山考:兼谈准噶尔遗产与清朝中亚外交之初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8本第2分,2017年6月。

⑥ 《定边右副将军富德等奏派员探听向巴达坎山索要霍集占消息折》(乾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8-1785-00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尔楚尔(alcu)、伊西洱库尔(isil kul)等地追击霍集占等,尽行歼灭,取其万余部众。霍集占等败走巴达克山。听闻将军、大人等已遣使赴我们巴达克山之汗(meni badakšan i han')素勒坦沙处,因我父年迈,即遣我祈求归附于大汗(amba han)。今遇大汗之使率我巴达克山汗之使前来,特派我呈递书信、礼物、马匹,将归附之故告于将军、大人等。^①

清朝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天山南北的场面给中亚的伊斯兰世界带来极大震撼,^②类似瓦罕等小部落便闻风而动。富德等清朝官员在奏折中将瓦罕称为“gašan”(村寨),据乾隆时期编纂的《御制增订清文鉴》载,“yaya hoton hecen i tulergi falga falga tehengge be gašan sembi(凡城墙外面,一片片居住的,称作村)”,^③这与米尔莽苏尔本人后来称瓦罕部落乃“建窝铺而居”(tobo arame tehebi)^④的自述是相符的,都在描绘一种简易、低级、乡野的聚落形态。而苏勒坦称素勒坦沙为“我们巴达克山之汗”,意指瓦罕曾附属于巴达克山的历史状况。因此,清朝对瓦罕的吸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作对巴达克山既有势力范围的冲击,瓦罕伯克米尔莽苏尔亲眼目睹清朝军队的强势后,便借向清朝表达归附之意的机会挣脱开巴达克山的控制。在接受瓦罕的投诚后,富德又于八月二十八日派遣侍卫额勒登额,“从衮都村(gundu gašan)之南山抄近路,道路甚是险峻,俱系冰石。又有大山岭,惟勉强赶路。四日后于九月初二日,抵至瓦罕村”,^⑤由此地再次前往巴达克山索要霍集占。

清朝官修史籍对此事件的记录可谓寥寥无几。乾隆四十七年(1782)成书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提到“拔达克山……其北鄙之城曰斡罕……在古当为乌秣国地也”;^⑥而《王公表传》的“霍集斯列传”部分记作:“时巴达克山伯克素勒坦沙不即以布拉呢敦等献,其邻部曰博罗尔,居巴达克山东,曰斡罕,居巴达克山北,霍集斯遣托霍斯迁伯克伊斯迈拉和卓,招降博罗尔,复自以哨探兵偕副都统伊柱屯斡罕。博罗尔伯克沙瑚沙默特、斡罕伯克密尔莽苏尔遣使告曰,‘巴达克山若不献逆,当助讨’。”^⑦除此以外,自二十四年十月以来,布鲁特、浩罕、安集延、巴达克山、博洛尔等部相继向北京遣使朝贡,乾隆帝于二十五年(1760)召见彼等,并“赐霍罕、巴达克山、齐哩克、博罗尔诸部使臣宴”,^⑧而同期归附清朝的瓦罕却始终未能赴京觐见。

乾隆二十五年的数份军机处档案可对此事提出解答。三月,瓦罕伯克米尔莽苏尔向回疆的叶尔羌城遣使,携有“奏给大主子(amba ejen)之书信,进贡之鸟枪、腰刀各二”,^⑨参赞大臣阿里衮将奏书及贡物移交给北京的军机处。米尔莽苏尔的奏书原本由波斯文写成,经过满文转译的内容如下:

在瓦罕之老奴米尔莽苏尔跪请大主子安:去年,将军率大兵前来追击贼寇霍集占时,进入古努特地方,老奴我听闻其事,派遣长子苏勒坦,阖部献首归附。又,苏勒坦如犬马一般,前去将军营中奋勇效力。圣主之大军前来给巴达克山之素勒坦沙消息后,将军率兵在瓦罕附近地方驻扎。遣使向巴达克山索要霍集占登之头颅尸骸时,我子苏勒坦亦同往,各处皆追随。取得霍集占之尸骸时,我子同行。将军以欲率我子苏勒坦入京城,朝拜主子之金颜而喁称时,我子苏勒坦足肿,不能前往而回,我为此斥责苏勒坦等无福。奴才我每日愁闷难耐之间,本年来

① 《奏瓦罕部伯克玛尔莽苏尔修书投诚折》(乾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8-1785-02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② Valikhanov, Chokan, “Alty-shahr: Historical Review,” in *The Russians in Central Asia: Their Occupation of the Kirghiz Steppe and the Line of the Syr-Daria*, London: Edward Stanford, 1865, p. 188.

③ 傅恒等撰《御制增订清文鉴》卷19《城郭类》,乾隆三十六年刊本,第33a页。

④ 《奏抓拿霍集占有功之瓦罕地方阿奇木伯克米尔莽苏尔请求恩赏片》(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8-1823-00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⑤ 《定边右副将军富德等奏派侍卫额勒登额由瓦罕前往巴达克山索要霍集占折》(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初十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8-1787-0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⑥ 钟兴麟等校注《西域图志校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83页。

⑦ 包文汉、奇·朝克图整理《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第1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标点本,第730页。

⑧ 《清高宗实录》卷604“乾隆二十五年正月丙辰”条,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785页。

⑨ 《驻叶尔羌大清国军统帅参赞大臣为收悉投诚奏书事回复瓦罕伯克米尔莽苏尔文文底》(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8-1824-0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巴达克山颁旨之大臣返回时,看见我之情势。奴才我已九十六岁,已将老首献给主子。此后愿为如天明般主子万岁。老奴我原无品物,与若干无能之辈建窝铺而居。此瓦罕一带地方有贼,奈何我处若有一物,则恶人即刻抢掠夺去;若不给与,则无计策。我之此等忧思,于何日可平?我已年迈,每思虑如何疼爱我子孙之事时,必不知饮食安眠。求大主子略施恩典。旁侧之巴达克山,若有侵扰,即不得安宁。请主子明鉴降旨,保我太平。^①

因为在搜寻霍集占中立有功劳,苏勒坦得到富德的特许,但却因极为偶然的身体因素而错失了这次宝贵的朝觐机会,致使瓦罕与清朝的关系此后只能长期维持在回疆地方的层面。伯克米尔莽苏尔还在奏书中表达了瓦罕归附清朝背后的政治动因:在通常情况下,中亚地区的商贾、外交使节可经瓦罕到色勒库尔,此地“在叶尔羌城西八百里,为外藩总会之区”,^②进一步前往回疆政治和经济中心之一的叶尔羌城。由于人员往来频繁,这条道路上经常会有盗贼出没,而仅有千余户部民且“建窝铺而居”的瓦罕囿于自身低级的部落组织形态,显然难以抵御这种恶劣的周边状况,亟需依靠清朝的威势来确保部族的平安;更不用说瓦罕地处巴达克山的东北部,历史上长期为巴达克山所属,所以米尔莽苏尔极为担忧巴达克山的侵扰。

然而,清朝官方却责成参赞大臣阿里衮回应,称“尔子苏勒坦先前得以朝觐大主子而未能成行,亦确系无福,尔斥责伊之言语甚对”,婉拒了米尔莽苏尔再次派遣长子朝觐的奏请。值得一提的是,阿里衮在致米尔莽苏尔的信件中还提到,“以尔先前派遣尔子苏勒坦曾追随将军营帐,为大主子效微薄之力,我将军、大人等怜恤尔诚心之回子,尔等前来之部众皆陆续赏赐银两、绸缎、衣服等物,又将尔设为阿奇木(akim),授予凭书(temgetu bithe)”,^③即存在一个清朝官员将其任命为瓦罕阿奇木伯克的过程,这虽然不是正式的册封或授品行为,却代表着瓦罕从属于清朝的例行程序。

随后几年,瓦罕仍然没有放弃最初的目标。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米尔莽苏尔再次以长子苏勒坦·赫·瑚巴特(Sultān Kay Qubād,即苏勒坦的全名)为使者抵至亮噶尔卡伦,由卡伦守卫护送到叶尔羌城后,递交写给参赞大臣额尔景额的波斯文信札及贡物腰刀2把。信件正文提到:

瓦罕部原为叶尔羌之属。我祖受叶尔羌大人等恩惠后居于瓦罕之游牧。现大圣主(amba enduringge ejen)统辖众部全境,怜恤全众,致阖部皆甚安好。奴才我亦系所属阿勒巴图,故昼夜准备效力。瓦罕地方乃一小部落,如同馆驿般为往来经过之大人、使者、商人所骑马匹供给饲料、草料,往来经过者皆知矣。此数年以来,阖部安好度日。本年未料一场大水降临,游牧之地大半被淹,除溃散至各处部众外,现唯有几人剩余,故各部之人前来,将我之人扰累。^④

米尔莽苏尔请求清朝差遣大臣督理相关事宜,并“派我子苏勒坦·赫·瑚巴特到京城,瞻仰大圣主之颜”。叶尔羌边臣坚持这些都是无理要求,并在报给北京的奏折中批驳道:

1. 虽然瓦罕自称“原为叶尔羌之属”——这当然是事实,譬如叶尔羌汗国的第四代君主马黑麻汗于1592年即位后,就曾任命其十二弟阿都刺因担任色勒库尔和瓦罕的总督^⑤——但并不像“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城回子一般,给主子进献钱粮以充贡赋”,所以不便“替其办理”平抑周边矛盾的事务。除此以外,额尔景额等还指出,“此等外藩(tulergi aiman)之人皆甚是贪鄙,爱讨便宜”,“如若为其游牧被水冲没之事遣人代为办理,则别部之人听闻后,皆彼此摹仿以至稟请,将滋生大乱”,必须打消他们的指望。

2. 至于朝觐之事,额尔景额等认为米尔莽苏尔父子在先前清军追击霍集占时虽立有微薄功劳,

① 《奏抓拿霍集占有功之瓦罕地方阿奇木伯克米尔莽苏尔请求恩赏片》(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8-1823-00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② 徐松:《西域水道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第63页。

③ 《驻叶尔羌大清国军统帅参赞大臣为收悉投诚奏事书回复瓦罕伯克米尔莽苏尔文文底》(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8-1824-0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④ 《叶尔羌参赞大臣额尔景额等奏瓦罕伯克米尔莽苏尔派使臣请安进贡折》(乾隆三十一年八月十七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82-2200-0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⑤ 魏良弢:《叶尔羌汗国史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0页。

却“妄自常寄希望于祈求施予主子之鸿恩”，而“此等小人亦不便派至京城”，于是便以“尔瓦罕之游牧现正有水患，需留办理之人，尔米尔莽苏尔又过于年迈”为由将苏勒坦遣回。

当然，额尔景额也并没有全然不顾瓦罕的处境，仍然在一定限度下给予指示。例如，对于瓦罕所起到中亚馆驿的作用和由此带来的成本和风险，额尔景额在交给尔米尔莽苏尔的札付中先称，“我使者若赴巴达克山或博洛尔时，会使其带去富裕之口粮、牲畜，原禁止扰累尔等”，但天长日久确实难保会有人逾禁违悖，所以他决定特地缮写一份“严飭书札”（*ciralame fafulara bithe*），铃印后作为“凭证”（*temgetu*）交付瓦罕，“嗣后若我等使者穿过尔游牧时，若有恣意勒索扰累尔等之举，尔即将我等交付之印结书札（*doron gidaha bithe*）出示，彼等见后即不敢胡乱行事”。^①最后，额尔景额将这份文书和作为此次进贡回赐物的两匹绸缎一并交给苏勒坦带回瓦罕。

总体而言，清朝与瓦罕的关系维持在边疆层面，尽管瓦罕多次向清朝表达赴京觐见的愿望，但清朝的反应却颇为冷淡，其背后缘由正如额尔景额等清朝官员所言：瓦罕部落的体量过小，清朝并无意强化自身与它的关系级别；另一方面，清朝官员认为外藩部落多系贪鄙小人，所以需要杜绝让这类小型部落凭借清朝之势滋生事端的可能性。综合上述考量，清朝便坚决地将瓦罕的朝贡活动限制在回疆地区，但瓦罕所上交的贡物亦会由官员呈递给皇帝。例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正月，叶尔羌办事大臣期成额便将时任瓦罕伯克苏勒坦·赫·瑚巴特于当年进贡的“腰刀两把”交由侍卫解京，^②同时清朝官员再回赐仓库储存的绸缎等物，由此在叶尔羌等回城完成地方性的朝贡。

三 清朝对瓦罕内部事务的“有限介入”

关于清朝与中亚的关系性质，学界既有的成果颇为丰富：张永江将哈萨克、布鲁特等界定为“名义藩部”，即指其兼有藩部和属国的特征；狄宇宙（Nicola Di Cosmo）指出，清朝通过与布鲁特游牧民的朝贡关系构建出一个超越领土阈限的、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势力范围，布鲁特领袖在其中借助清朝的赐封维持对部族的统治，并得到贸易市场，及在面对浩罕等敌对邻国的庇护；傅礼初（Joseph F. Fletcher）注意到浩罕汗国的使者赴京时，乾隆帝通过口译唤浩罕伯克为“吾子”，代表着两者并非单纯的、同质于儒家文化圈的封贡关系；吴劳丽（Laura Newby）认为清与浩罕的外交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蒙古式的普世主义”（Mongol-style universalism），而日本学者小沼孝博以“主奴”（*ejen-albatu*）关系来定义清朝和以哈萨克为代表的中亚首领们所形成的区域政治秩序。^③

这些论著所涉及的中亚政权虽各不相同，却都揭示出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清代中亚的藩属体系恐怕有别于东亚地区的封贡体系，两者的区别不仅体现在文化原理内核，还包括交聘的礼仪与实质活动。例如，清朝在与朝鲜、琉球和安南等东亚属国交往时，都会遣使册封国王及其正妻和世子，颁布诏敕，授予诰命、印章等，^④并不会与属国国王的臣子有过多牵扯；在处理中亚地区的涉外关系时，清朝虽然也曾有过如册封哈萨克中玉兹汗王的活动，但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策略则是对中亚的

① 《叶尔羌参赞大臣额尔景额等奏瓦罕伯克米尔莽苏尔派使臣请安进贡折》（乾隆三十一年八月十七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82-2200-0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② 《叶尔羌办事大臣期成额为报博洛尔瓦罕伯克进献贡物由叶尔羌派员解京事咨呈》（乾隆三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84-2371-03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③ 参考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变迁为中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59—168页；Nicola Di Cosmo, “Kirghiz Nomads on the Qing Frontier: Tribute, Trade, or Gift-Exchange?” in Nicola Di Cosmo eds., *Political Frontiers, Ethnic Boundaries and Human Geographies in Chinese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 351—372; Joseph F. Fletcher, “China and Central Asia, 1368—1884,” in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pp. 206—224; Laura Newby, *The Empire and the Khanat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Qing Relations with Khoqand c. 1760—1860*, Leiden: Brill, 2005, p. 42; 小沼孝博：「清朝とカザフ遊牧勢力との政治的關係に関する一考察：中央アジアにおける『エジェン-アルバト』關係の敷衍と展開」、『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72, 2006, 39—63頁。

④ 参见何新华：《清代朝贡文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

贵族领主们授予顶翎^①——这意味着清朝不仅与君主或带有国家性质的中亚政权建立关系,更着眼于向清朝表达归附之意的“外藩”。

外藩是对满语 *tulergi aiman* 的翻译,直译是“外部的部落”,见于各类中亚事务的官方档案,主要是指归附清朝但又不直接隶属藩部的中亚部落。这个术语的内涵也包括具有国家性质的属国,只是比后者的范围更为广泛。换言之,清朝更多是以部落而非“国家”(gurun)视角处理中亚事务,这种观念也符合中亚的实际情况,中亚多数小型政权的组织形式确实是部落而非集权化程度更高的国家。基于中亚政权的规模、关系的远近亲疏等情况,清朝在王位封授、赏赐印信或顶翎、准许赴京朝贡觐见或维持边疆朝贡等具体问题上采取灵活却又有原则的立场,构建起由近及远、多元的中亚藩属体系。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东亚封贡体系内沿袭的原则都应被重新审视。例如,一般认为历史上中国封建王朝在大多数时间内并不干预属国的内政。^②但在瓦罕的案例中,这一观察有待商榷:尽管清朝边臣并不积极参与瓦罕的内政,但仍应瓦罕统治者的请求介入其中。

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朝得知米尔莽苏尔的长子苏勒坦和次子沙扎罕(Shāh Jahān)“曾为争分家产事,赴巴达克山之素勒坦沙跟前”。^③米尔莽苏尔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之间虽然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但彼此的利益矛盾却不断积蓄,直至乾隆四十七年终于爆发。四十七年八月,苏勒坦·赫·瑚巴特亲赴叶尔羌城向办事大臣复兴等控诉道:

我苏勒坦·赫·瑚巴特之父米尔莽苏尔,二十三年迎接大军,与将军、大人等会面后,献首归附于大主子。而后,因我父米尔莽苏尔病故,瓦罕之游牧便分子苏勒坦·赫·瑚巴特、我弟沙扎罕(Saijagan)而居伯克位。此数年来甚是亲密和睦生活。现我弟沙扎罕骤然性情变化,倚恃力强,以我弱小而肆意欺压,心生欲独占瓦罕之全境而将我父子侵害之恶念,而后率兵将我围困。我苏勒坦·赫·瑚巴特自围困之地逃出后,携我子、妻及随从来叶尔羌时,将我妻、三子及随从百余人皆留于卡伦外名为巴日勒之地。现唯率我一子、随从十九人前来。如今已无以自存,祈求大人等施恩,向大主子具奏,救我性命。^④

复兴接到呈文后质疑道,既然兄弟之间多年无事,“详察现尔等骨肉之间猝然反目,尔自游牧离开,沙扎罕独自占据瓦罕全境之故,此显皆尔此数年安居而内心骄纵,失兄之道,偏袒子妻之浅见,听下人离间之语而致猜疑生”,苏勒坦对此诘问的回答则是支支吾吾,复兴等遂觉其控诉属一面之词。此时,沙扎罕的使者也抵达叶尔羌并呈文道:

奴才沙扎罕我甚是安好。我瓦罕之地方,原系与叶尔羌所属之小亮噶尔相同之远孤部落。凡看到商人抵至,奴才等竭力奔忙饯行,甚是安居。现我兄驻管森济色迪斯地方,伊平素肆意勒掇下人,不能安抚人心。因使瓦罕之地方遭殃,半数人借逃散各地,剩余十余户人,被我规劝阻止,将其聚拢带至森济色迪斯,将地方占据后,暂行驻守。将此呈报于大人等。如何嘱托,沙扎罕我谨感戴遵守而行。如若我言语有不实之处,即可遣人察访实处。^⑤

面对这两份内容矛盾的札文,叶尔羌城的官员们难以判断孰是孰非。但在他们看来,“外藩之人,父子、兄弟彼此猜忌,不计人伦,任意自相戕害,乃其内部常有之事”,无需一再请求乾隆帝降旨裁决。复兴在和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第商议后,决定派遣叶尔羌六品伯克买玛第敏和管理布鲁特之戴五

① 英卡尔·巴合朱力:《顶翎与治边:清朝对哈萨克的顶翎政策(1765—1849)》,《清史研究》2022年第2期;张伯国:《翎顶赏赐制度与清代布鲁特治理新探》,《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9期。

② 陈尚胜:《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2期。

③ 《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奏瓦罕伯克米尔莽苏尔等因赏缎匹而谢恩并呈文称其二子争斗分家情形折》(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十一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9-1921-0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④ 《叶尔羌办事大臣复兴奏遣叶尔羌伯克随布鲁特瓦罕伯克苏勒坦和和巴特调解其兄弟之争》(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十八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90-2936-05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⑤ 《叶尔羌办事大臣复兴奏遣叶尔羌伯克随布鲁特瓦罕伯克苏勒坦和和巴特调解其兄弟之争》(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十八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90-2936-05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品顶戴花翎库楚克将苏勒坦护送回瓦罕,并把两封札付分别交给苏勒坦和沙扎罕,劝诫他们兄弟二人理应和睦相处。买玛第敏和库楚克返回后又将此情况汇报给复兴,表示得到当事者的承诺,“瞻望大人等教嘱之札,沙扎罕我方见我之过错”,并“遵照大人等之教嘱,沙扎罕我将我兄所属地方,在买玛第敏伯克等面前交于伊”。^①但是,清朝官员对这番保证的执行情况缺乏实质性监督,沙扎罕很快就故态复萌。

乾隆四十八年(1783)五月,苏勒坦派遣其子帕尔哈特伯克至叶尔羌城禀报,在买玛第敏和库楚克离开瓦罕后,“沙扎罕又食言悖逆,并未将其暂时带走我游牧之数人,及色迪乌苏塔喇克之地给予我”,^②反而继续俘掠其部众、土地和牲畜,是以请求清朝调停。在这种情况下,复兴派买玛第敏和库楚克再次赴瓦罕沙扎罕处调解双方的矛盾,在致沙扎罕的札付中质问道:

如今尔听何人挑唆之语,何以又食言悖逆?不给还所占之地方、抢夺之人畜且反而抢占,有将人、马、牛等物掠夺之举,是为何故?即应将尔从重治罪,示惩戒于众人。唯因不可信苏勒坦·赫·瑚巴特一面之辞,我暂且将尔宽宥。如今再遣买玛第敏伯克、库楚克伯克到瓦罕,其抵达后,沙扎罕尔务必照我等嘱托,将尔所占据苏勒坦·赫·瑚巴特之地方,尔掠夺之人、马、牛等物,如数交出,当我等派遣至伯克等面前,即作速给还。如若有推三阻四之举,必将尔沙扎罕,如同袞都伯克沙莽苏尔(gun i bek Šamangsūr)一般拿获,使居于叶尔羌之僻静弯曲处,将尔部落交由他人管理。^③

叶尔羌边臣在札付中作出威胁姿态,要求瓦罕伯克遵守调停结果,否则将剥夺其部落统治者的地位。尽管苏勒坦和沙扎罕都在买玛第敏等面前表示顺从,但双方的争斗却持续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时任叶尔羌办事大臣塔琦派五品阿奇木伯克巴克沙持两封札付前往瓦罕,劝说兄弟“自此唯谨遵大人等之教嘱,以得永久和睦而居”,而在巴克沙持的开解下,两人“举动样子甚是恭敬,对我之照料亦甚佳”,并“欣然承诺,深表感激之情”。^④这是有关两位瓦罕统治者争斗问题的最后一份档案,此后他们是否放下芥蒂,遵照清朝官员的嘱托行事,我们不得而知。

总体而言,在面对瓦罕的内部事务时,清朝并非秉持彻底回避的态度,而是采用一种“有限介入”(limited engagement)原则来应对瓦罕伯克的诉求。所谓的“有限介入”的底线即指清朝绝对不会轻易军事介入中亚的任何争端,避免由此带来的边疆统治成本的负担,这一原则自乾隆平定回疆初期起就在逐步确立。^⑤因此,无论瓦罕的两位伯克是否真正遵从清朝官员的决断,清朝都无意派遣军队深入中亚以直接平息瓦罕的内部纷争。但作为清朝中亚藩属体系的成员之一,无论清朝是否乐于管辖境外事务,都有必要维系自身与外藩的关系。

事实上,瓦罕在清朝的中亚情报网络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以来爱乌罕征讨巴达克山的过程中,瓦罕为清朝探获了相当数量的情报,^⑥清朝边臣甚至鼓励沙扎罕称“尔唯自此将游牧之人众妥善管束,取和于邻部(adaki aiman),安宁生活,永远勤于领受大主子

① 《叶尔羌办事大臣复兴奏闻派人说和瓦罕伯克苏勒坦赫呼巴特兄弟情形折》(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初四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90-2942-0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② 《叶尔羌办事大臣阿扬阿奏办理瓦罕伯克苏勒坦和呼巴特兄弟争夺人畜纠纷案并呈咨稿折》(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90-2990-02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③ 《叶尔羌办事大臣阿扬阿奏办理瓦罕伯克苏勒坦和呼巴特兄弟争夺人畜纠纷案并呈咨稿折》(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90-2990-02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④ 《叶尔羌办事大臣塔琦奏报派人劝瓦罕伯克赛扎干兄弟和好情形折》(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初八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92-3161-02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⑤ 参考 Matthew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86—87; 马子木:《经略西北:巴达克山与乾隆中期的中亚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21页;成崇德:《论清朝的藩属国——以清廷与中亚“藩属”关系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⑥ 马子木:《经略西北:巴达克山与乾隆中期的中亚外交》,第98—119页。

之恩惠,将所闻消息核实后立即察明来报”。^①因此,清朝不能完全无视瓦罕的请求,必须在不违背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回应,以维持对瓦罕等外藩的统治权威性。清朝官员一方面派遣布鲁特领袖或回子伯克作为回疆当局的代表前赴瓦罕进行调停,另一方面则通过札付(afabuha bithe)来对瓦罕伯克进行劝说、宽慰和指示,两者结合使用,构成了外交与政治层面的对中亚外藩事务的“有限介入”模式,由此在最大程度上及最小代价下消弭瓦罕内政的不稳定给清朝边疆安全和藩属体系所带来的挑战。

最后,自乾隆四十七年到五十二年间,虽然叶尔羌官员及伯克对瓦罕事务的处理方案和解决经过皆报告到北京,但乾隆帝本人却未曾过多干预边疆官员的决策,他的朱批多为“sain saha(好,知道了)”、^②“manggai uttu icihiyara dabala(不过如此办理而已)”^③等代表肯定或默认意义的语句,表示出对回疆地方当局建议的尊重,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是瓦罕和清朝关系实质的印证——即更偏向于边疆地方的微观层面,而非国家朝廷的宏观层面。

四 瓦罕与巴达克山、布鲁特的争端及清朝的应对

瓦罕地处巴达克山的东北部,且又靠近清朝回疆的边境地带,其部落的安全不免会受到巴达克山及游荡在卡伦内外的布鲁特诸部的影响。巴达克山乃清朝在中亚的属国,以乾隆二十四年移交霍集占尸骸事件为归附清朝的标志。至于布鲁特的组成则较为复杂,包括与清朝关联最紧密的“内地”(dorgi ba)者,亦有属于卡伦以外的“外藩”诸部,还存在“以外藩习俗,与中国异宜,不欲投诚降服”^④的“永守边界”之布鲁特。^⑤当瓦罕与巴达克山、布鲁特诸部发生争端时,清朝的应对策略恰恰能够揭示出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同时亦能体现前文所言“有限介入”的交涉准则。

(一) 瓦罕与巴达克山的争端

自瓦罕归附清朝后,巴达克山仍保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而瓦罕伯克米尔莽苏尔对此极为担忧,屡屡希望借清朝之力挣脱。乾隆二十七年正月,沙尔呼勒商伯克玛塔尔穆到瓦罕交付清朝的赐物时,米尔莽苏尔委托他将一封呈文带到叶尔羌,内中称:“先前,我二子曾为争分家产事,赴巴达克山之素勒坦沙跟前。现各自回来。素勒坦沙称我为一不中用之人,强横遣人专将我产拨于彼等。虑及素勒坦沙仍将我忌恨,所求之事乃请将军、王怜悯我老命,指给我一条奋勉之路。”^⑥这番话透露出,彼时瓦罕的内政仍被巴达克山控制,致使苏勒坦和沙扎罕在进行部落的财产分割时,需赴巴达克山请求素勒坦沙裁决。

在览遍米尔莽苏尔的书信后,办事大臣新柱等却认为素勒坦沙“以米尔莽苏尔年迈而将其家产分给伊子,并未侵掠其游牧”,称“伊称遭素勒坦沙忌恨而请求教诲之奏,诚属年老昏聩”,便命商伯克玛塔尔穆将一封札付带到瓦罕,对其开导训示:

我等为尔等将此事尽心筹划。素勒坦沙并无将尔怀恨之事。何以谓之?尔今已年岁甚高,理应思自养安居,应将部落事务分予尔子嗣管理,尔将要紧之事统揽办理。现素勒坦沙如

^① 《乌什参赞大臣永贵奏巴达克山伯克苏尔坦沙遣使至叶尔羌报告爱乌罕地方情形折》(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初二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83-2281-0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② 《叶尔羌办事大臣阿扬阿奏办理瓦罕伯克苏勒坦和呼巴特兄弟争夺人畜纠纷案并呈咨稿折》(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90-2990-02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③ 《叶尔羌办事大臣复兴奏遣叶尔羌伯克随布鲁特瓦罕伯克苏勒坦和和巴特调解其兄弟之争》(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十八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90-2936-05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④ 《清高宗实录》卷555“乾隆二十三年一月丙辰”条,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30页。

^⑤ 窦忠平:《1697—1760年布鲁特与清朝政治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民族学学院,2010年,第31—35页。

^⑥ 《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奏瓦罕伯克米尔莽苏尔等因赏缎匹而谢恩并呈文称其二子争斗分家情形折》(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十一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9-1921-0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此替你安排,我等还以其为有怜悯尔之意。将其人口、游牧分给尔子者,与尔所统辖皆相同。素勒坦沙又未抢掠尔之部落。尔何必胡乱猜疑?尔嗣后惟有教导子嗣,以将部落事务妥善办理。光天化日之下,仰赖大主子之恩,安逸而居,含饴弄孙是也。尔寿命绵远,部落之人亦得而安静度日。尔何必多余烦闷?好生遵循我等所言,切勿违悖,特此交付。^①

作为直观对比,在同年发生的巴达克山侵占博洛尔所属之奇特拉尔领土事件中,新柱认为此举“形同叛逆,甚为可憎”,遂建议乾隆帝发兵征讨巴达克山(此议最终被乾隆帝否决)。^②由于博洛尔亦为清朝的中亚属国,而素勒坦沙侵吞奇特拉尔之举明显构成对清朝中亚权威地位的挑战,故新柱等官员的反应极其激烈。相较而言,他们对于素勒坦沙在瓦罕的所作所为要平静很多,除了瓦罕仅为在叶尔羌城朝贡的外藩诸部,其地位远不能与博洛尔相提并论的客观因素外,素勒坦沙只是代替米尔莽苏尔行使分家之权,而非侵吞瓦罕的领土,并没有实质性地损害清朝的利益,这里所谓的“实质性”指劫掠或侵吞其他外藩的领土等行动,它们决定着清朝官员的反馈力度。

乾隆三十四年(1769)十二月,继任的瓦罕伯克苏勒坦和沙扎罕遣使到叶尔羌呈给办事大臣期成额、额敏和卓波斯文书信各一封,并由阿奇木伯克鄂对翻译成满文,内称:

瓦罕之人系与叶尔羌卡伦相同驻守之阿勒巴图(albatu),原本给与往来者口粮、给马匹草料。如今巴达克山使者往来经过时,扰害我游牧之人。在我等先前惯例中,所过使者之一匹马每日给两小回帽粮食,现索要八帽粮食;使者等歇宿时,索要羊、酥油,且又从我等所属之小部落处索要皮袄、袍子、鞋各十件,马驹各十头,皮张、带子等零碎物件。又将众使者之行李命我下人背负而行,已有数人死亡。又换乘我等马匹,原无此等惯例。我等以叶尔羌之大人曾嘱咐不可扰累部落众人之处告于使者等,伊等反倒愈发刁难。^③

经过对使者的当面盘问,期成额等确定呈文中的物品数目与口供相符。期成额等认为,“巴达克山、瓦罕等部之人,皆同样为主子之阿勒巴图”——阿勒巴图源于蒙古语的 albatu,即封建领主的属民之意,而“主子—阿勒巴图”也是蒙古社会的基本结构。^④这种说法在很多蒙古语文献中都有提及,如萨囊彻辰《蒙古源流》便称“庶民百姓(qaraču irgen),岂能无主(ejen)”。^⑤由于准噶尔汗国曾作为一强权出现于中亚地区,清朝在与中亚世界打交道时,便多以蒙古的政治传统和文化为媒介,^⑥这里强调的其实是巴达克山与瓦罕皆系清朝藩属的事实——不管是否发生了换乘马匹、索要下人背负行李致死等事端,“若有使用口粮、衣物等事,理应互相沽卖、交易”,而巴达克山使者赴回疆时,“仍拘泥其旧习(fe tacin),向瓦罕处获取口粮、衣服,殊属非是”。期成额等同时辩解道,呈文中提到的巴达克山使者盖巴尼咱尔(gaibanidzar)在到达叶尔羌前,清朝官员对其出访毫不知情。然而,期成额等还是在寄往瓦罕的札付中保证,“嗣后……若有巴达克山往来之使者,勿论各自绑缚口粮而行,尔等无需供应;若致途中不能供给而有彼此交易买卖之事,任凭尔等意愿”,并且也对盖巴尼咱尔等提出了相应的警告。

清朝对于瓦罕和巴达克山争端的介入程度也就仅限于此。乾隆三十五年(1770)十月,叶尔羌办事大臣期成额建议,“沙尔呼勒之外巴达克山、什克南(sik nan)、博洛尔(bolor)、奇特拉尔(citarar)、瓦罕、袞都、萨尔哈特(sarhat)等部虽有归附之名,却不可与纳贡之回子(alban jafara hoise)等相比”,故而如果它们“彼此抢掠,在奴才等前争讼”时,“若无涉及咱们边疆(musei jecen)之事,奴

① 《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奏瓦罕伯克米尔莽苏尔等因赏缎匹而谢恩并呈文称其二子争斗分家情形折》(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十一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9-1921-0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② 马子木:《经略西北:巴达克山与乾隆中期的中亚外交》,第82—83页。

③ 《叶尔羌办事大臣期成额奏报瓦罕伯克遣使到叶尔羌告称巴达克山往来使者骚扰伊都情形折》(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八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84-2359-0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④ 弗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焄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279—282页。

⑤ 乌兰:《〈蒙古源流〉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653页。

⑥ 马子木:《乾隆朝初通巴达克山考:兼谈准噶尔遗产与清朝中亚外交之初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8本第2分,2017年6月。

才等唯持道理(doro giyan)教导驳回”,但是如果“有咱们布鲁特(musei burut)将伊等劫掠之事,则奴才等照常严加办理”,此奏得到乾隆帝的批准。^①

四十三年(1778)十二月,乌什参赞大臣永贵接到苏勒坦和沙扎罕使者带来的呈文,提到“巴达克山之伯克巴哈杜尔沙(badakšan i bek bahadurša)与我等结仇后而为仇讎,曾骚扰抢掠我等地方,拿走若干物件。将我弟沙扎罕自罕都特逐出,霸占我父、祖之故土,且还派兵欲毁我瓦罕之游牧”。^②事实上,巴哈杜尔沙的行动是对瓦罕此前侵略巴达克山的报复。四十年(1775)八月,色勒库尔阿奇木伯克阿卜喇撒就曾向叶尔羌官员提供情报,称“什克南伯克沙旺迪(sik nan i bek šawangdi)、瓦罕伯克沙扎罕、素勒坦沙之子迈默特沙(sultanša i jui maimatša)三人,彼此串通,欲自什克南囤兵,前去攻打巴达克山之巴哈杜尔沙”。^③随后,清朝从沙扎罕派遣至叶尔羌的使者口中获悉:

我伯克沙扎罕与什克南伯克沙旺迪沾亲,素勒坦沙之子迈默特沙畏惧巴哈杜尔沙,赴什克南处躲避后,请求援兵。沙旺迪听从,率两千兵与迈默特沙一同来到瓦罕。沙扎罕思及与沙旺迪沾亲,便给其侄儿阿克尼咱尔一百兵,帮助迈默特沙往征巴哈杜尔沙。我伯克现在瓦罕,此前巴哈杜尔沙多次遣人,欲使我伯克追随他,皆未依从。现又助兵,往征巴哈杜尔沙。若迈默特沙等获胜则甚佳,如败于巴哈杜尔沙之手,恐巴哈杜尔沙后日将侵我伯克,是以特派我穆尔哈比前来呈文,请安于将军、大人等。^④

巴哈杜尔沙(Bahādur Shāh)与迈默特沙(Muhammad Shāh)皆曾为素勒坦沙后巴达克山的统治者,也就是说瓦罕卷入到巴达克山内部的争斗中,^⑤并为此感到惶惶不安。叶尔羌官员们对于沙扎罕妄图借助清朝之势来消弭危机的请求嗤之以鼻,决定“预先揭露其奸诈计谋”,严厉斥责以断其指望。因此,当三年后巴哈杜尔沙来犯时,清朝并未有任何行动,仅以札付建议瓦罕“嗣后唯感戴大主子之恩,仍照先前安静而居,与邻部求和睦,妥善管束守卫部落,抚恤下人”。^⑥另外,在四十年和四十三年两次事件中,清朝官员并未向巴哈杜尔沙或迈默特沙中的任何一人寄札付劝诫,意味着经过多年外敌来袭和内乱后,巴达克山已经基本脱离了清朝的藩属体系,不再受到清朝势力的约束。

(二) 瓦罕与布鲁特的争端

瓦罕与游牧于清朝边疆内外的布鲁特诸部的争端,主要在于后者经常性的劫掠活动。目前较早的记录见于乾隆三十四年,瓦罕伯克沙扎罕以布鲁特劫掠其部内人畜为由向清朝求助。叶尔羌办事大臣责成布鲁特散秩大臣阿齐睦悉心探访,前往哈喇提锦(hara tigin)布鲁特游牧地将涉案的两名布鲁特人找出,并查出瓦罕总计被掳走46口人,60匹马牛驴和400余头羊,但由于各种特殊情况,如其中有2口人、百余头羊和40匹马早已被贩到安集延,只将能够搜寻到的人畜交还瓦罕。^⑦

自此以后,瓦罕凡遇布鲁特劫掠之事,便奏请清朝代为索还。从清朝的角度来说,这恐怕会引发其他附带问题。例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瓦罕伯克沙扎罕奏称:

前我兄苏勒坦派其子帕尔哈特、阿克尼咱尔后,希卜察克部之布鲁特多连之子都尔第、其

① 《叶尔羌办事大臣期成额奏嗣后尽量少管巴达克山什克南博洛尔等处番相互诉讼事宜片》(乾隆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83-2342-0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② 《乌什参赞大臣永贵奏报瓦罕伯克遣使呈报拔达克山派兵攻占其属地情形折》(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88-2774-02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③ 《叶尔羌办事大臣玛兴阿奏闻巴哈都尔沙占领巴达克山并令瓦罕伯克赛占噶安分守纪等情折》(乾隆四十年八月二十九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87-2646-0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④ 《叶尔羌办事大臣玛兴阿奏闻巴哈都尔沙占领巴达克山并令瓦罕伯克赛占噶安分守纪等情折》(乾隆四十年八月二十九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87-2646-0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⑤ The Editor, "Rough Chronological History Of Badakhshan," *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Swan Sonnenschein & Co., Ltd, 1895, pp. 434—435.

⑥ 《乌什参赞大臣永贵奏报瓦罕伯克遣使呈报拔达克山派兵攻占其属地情形折》(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88-2774-02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⑦ 《叶尔羌办事大臣期成额奏布鲁特归还所抢瓦罕人畜折》(乾隆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83-2342-02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弟色提巴尔第,引领布鲁特沙布塔、阿塔拜、格纳拜、舍第、提利亚奇,奈曼部之布鲁特喀第、托克塔呼勒、舒古尔比、阿卜甘,提依特部之布鲁特,接连七次将我所属地方劫掠。此外,多连之子将罕都特地之一人绑于炭火中烧死,将一人打死。庄稼皆置马匹踩踏,所住房屋亦被毁坏。奴才我躲藏于一小院落内,幸而得救。祈求怜悯。此次被布鲁特等劫走之人、物件等数额,人五百,马、牛、羊、鸟枪笼统估计,总计三千。^①

沙扎罕向清朝讨要被抢走的人畜物品。乾隆帝在命人追缴的同时,还派喀什噶尔办事大臣保成责问希卜察克的布鲁特比多连,其家族受清朝恩典,“竟敢邀人数次劫掠沙依札罕等人牧场,抢夺人、物、牲等项,何为?现若将情奏闻圣主,定牵连尔,不仅革职问罪,且致家园一并扣除。此间,我等因尔前稍效力而予原谅,暂不具奏大圣主,特谕告尔,尔应速核此事,将尔子弟等屡次劫掠沙依札罕等人、物、牲等,照数催缴赔偿,方能平息此事,尔等家业、园子及数年来大圣主所施之恩,皆可保全”。^②然而,正如四十四年哈喇提锦部劫案的情况一样,被布鲁特劫走的人畜其实很难全部追回,是以清廷于五十二年正月下谕道:

前为希布察克等部之人劫取瓦罕、棍等地方人、马畜,札飭多连令其追回案。兹多连遣其子等,不久由该部追出带回人畜,然被劫部落之人仍嫌少而争执……多连遵行臣等札飭,立即派人赴各部追索,不久即能追回人畜者,尚嘉,无须深究,将追出人畜交还失主了结则已。倘瓦罕、棍等部之人并不知足,仍执意追加,则断然不可……今众布鲁特等,因皆归附,方如此恭顺退还所掠物项。此前亦能如此追回乎?况且,此等人亦应各自设防自己部落,则遇有前来抢掠者,断无不能抵御之处。然平素疏虞,并不留意设防各自部落。万一发生抢劫等项事件后,岂能仅靠官代为追出乎?著将此札飭塔琦等,此等情形,当作伊等之意明白开诚晓谕瓦罕、棍等部之人,保成等将解送之人、畜交还结案,断不可使此等人随意妄加侥幸争取。^③

这道上谕成为此后清廷处理类似事务时的准则。清朝官员会尽力帮助瓦罕部讨回被布鲁特劫走的人畜物品,但绝不会任其所请而妄加追缴。清朝极其清醒地认识到,布鲁特诸部的首领同意归还劫掠的物品,乃是由于他们均已归附清朝的缘故。因此,清朝回疆的官员有必要平衡不同外藩成员的利益,绝不可能一味地为瓦罕出头而招致布鲁特诸部的不满。

总 结

近年来,学界对清朝中亚藩属体系的特性问题提出了各种新观点,其中一点即清朝是否会介入中亚事务的问题,很多学者都持否定看法。这确实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例如,在面对阿富汗杜兰尼王朝(爱乌罕)这样的强邻时,乾隆帝君臣深知其实力不可小觑,遂对“爱乌罕爱哈默特沙所有之地”发生的任何事务,素来持“不必办理”之意见,避免与其发生军事冲突。^④此外,乾隆帝还曾多次表示“朕统一区宇,尔哈萨克、布鲁特、霍罕、安集延回众,皆朕臣仆,朕一视同仁,毫无偏向”,^⑤不愿轻易卷入藩属之间的争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清朝在天山南路的军事力量极为有限。^⑥

① 《叶尔羌办事大臣塔琦奏报叶尔羌布鲁特希布察克部抢掠瓦罕伯克牧场折》(乾隆五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92-3140-00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② 《寄谕喀什噶尔办事副都统衔保成等著晓谕多连妥办其子弟事》(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19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56页。

③ 《寄谕叶尔羌办事大臣塔琦等著将追回之人畜交还瓦罕等部》(乾隆五十二年正月十六日),《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19册,第564—565页。

④ 惠男:《萨木萨克早年经历考:清朝在喀什噶尔与中亚帕米尔以西的政治困境,1759—1784》,《“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09期,2020年。

⑤ 《清高宗实录》卷1024“乾隆四十二年正月丁丑”条,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722页。

⑥ 马子木:《经略西北:巴达克山与乾隆中期的中亚外交》,第121页。

据魏源《圣武记》载,“其回疆南路,则皆换防之兵,共五千七百有六十”,^①其中在毗邻中亚的叶尔羌及喀什噶尔两城各有兵约 900 名,在薄弱的兵力部署的情况下,清朝显然缺乏对中亚地区的投射能力,所以才会采取相对克制的中亚政策。

然而,如果单纯地将清朝的中亚政策总结为某种绝对的“不干涉”或“不干预”主义,亦无法反映历史事实的多面向。正如陈尚胜所言,“清朝所构建的封贡体系,它的首要特征表现为国防安全的防御体系……清朝最高统治者希望通过与周边诸国的封贡关系来建立自身的藩篱和屏障之意图”。^②清朝有必要通过维护中亚的藩属体系来拱卫天山南路回疆的安全,更不必说中亚藩属本身就具有情报战略意义。因此,与其教条性地将清朝的中亚策略形容为“不干涉”或“不干预”主义,倒不如思考,在何种情况下,清朝不会干涉中亚事务?以及在何种情况下,清朝会插手中亚藩属的事务,而这种介入又可能到什么程度?本文通过瓦罕的案例对此提出了若干个人见解,清朝对于与瓦罕有关的中亚事务采取了“有限介入”的原则,简而言之:

1. 清朝官方始终拒绝以武力直接干涉中亚事务。
2. 对于瓦罕内部的矛盾,清朝官员并不完全拒绝参与调解,但主要是采取寄出边疆官员的札付、派遣伯克和布鲁特使者的形式干预,而非派兵强硬执行。
3. 在乾隆二十四到三十五年间,清朝对于瓦罕及其邻部的争端,如果涉事双方均处在藩属体系之内,则会通过外交和政治层面的解决。自三十五年以来,清朝拒绝卷入帕米尔以西地区的中亚藩属之间的斗争。
4. 在三十五年以后,事涉瓦罕和布鲁特之间的矛盾,清朝仍旧会积极斡旋与解决,但同时也会注意平衡双方利益,不会一味按照瓦罕的请求办理事务。

最后需注意以上仅为乾隆年间清朝的策略,倘若将研究时段顺延到嘉庆、道光时期,情况恐又会不同。例如道光二年(1822),清廷针对瓦罕遭奈曼布鲁特抢掠之奏下谕道,“斡罕部落,两次被奈曼爱曼之布鲁特抢去人口马匹牛羊,该伯克遣人赴喀什噶尔、叶尔羌呈递信字,恳求查追,当即驳饰……卡伦以外,爱曼甚多,彼此抢劫,事所常有,若代为追查,则各爱曼遇有抢失之事,难保不架词呈诉……嗣后遇有此等抢劫之案,竟可置之不问,免致别滋事端”,^③这显然与乾隆时期的政策相悖,体现出彼时清朝在中亚权力网络的收缩之势。因此,我们在讨论清代中亚藩属体系的特性问题时,应以动态的视角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 世纪上半叶清朝的边疆与边政研究”(项目批准号:22&ZD23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74 批面上资助“满蒙档案与基金治理视域下的清代回疆伯克研究”(资助编号:2023M740087)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施恬逸)

① 魏源:《圣武记》卷 4《乾隆荡平准部记·附录》,《魏源文集》第 3 册,岳麓书社 2004 年版,第 156 页。

② 陈尚胜:《试论清前期封贡体系的基本特征》,《清史研究》2010 年第 2 期。

③ 《清宣宗实录》卷 28“道光二年正月乙丑”条,中华书局 1986 年影印本,第 507 页。

Abstract

Rogers Plan and the United States's Initial Effort to Reconcile Arab-Israeli Conflict

ZHAO Wenliang, Zhang Xue

The present paper, analyzing reasons why the plan proposed by William P. Rogers, then the United States Secretary of State, failed twice because of the irreconcilability of Arab States and Israel, other major powers' un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and the inherent defect of the United States's policy of balance and reciprocity, contends that, despite the failure, the U. S. became more diplomatically experienced in the Middle East and started to act alone in partially solving the conflicts and peddling its peace process in this region.

Commemorative Street Names and the Jewish Nation-State Building: The Case of Tel Aviv

AI Rengui

The present paper, shedding light on the history, in which street names of Tel Aviv were systematically named in commemoration of historical Jewish figures such as heroes in biblical times and medieval Jewish thinkers, contemporary Jewish celebrities such as early well-known Zionist, and non-Jewish people in relation to Zionism according to Ben-Yishai rationale since the 1930s, concludes that this practice helped the Jewish nation-state building extend down to everyday life, promoted the Judaization of urban space, and consolidated Israel's occupation of new areas.

Elite Arab Families of Jerusalem and Palestinian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ZHANG Xin

The present paper, analyzing elite Arab families in the urban area, which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the local politics and resistance against foreign invasion and strived to create the consciousness of national identity by integrating family interests, idea of rejuvenating Arab nation and religious feeling anchored in Jerusalem, contends that they did lead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ist movement around the First World War but meanwhile they made Palestine's national independence tortuous due to their own historical limitation and factionalis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Qing and Wakhan in Qianlong Reign: An Observation through Manchu Archives

HUI Nan

The present paper, having its observation based on Manchu archives attributed to the Grand Council of State, argues that, as rebellious regimes were annihilated one after another in Xinjiang, Qing and the Wa-

khan started to act on each other directly. It goes further, reexamining Qing's principle of limited intervention in handling the Central Asian affairs by analyzing Emperor Qianlong's policies on Wakhan's internal strives such as the disputes involving Badakhshan and Burut tribes.

Railway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Urban System of the Northern Area of Northeastern China in Modern Times: A Study Centered on the Local Garrison Towns NIU Shuzhen

With the rise of modern railway traffic in the northern area of Northeastern China, a number of new towns emerged along the railway, which changed the structure of the regional urban system mainly composed of garrison towns. This was the first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gional urban system focusing on the Trans-Manchurian Railway. The status of Harbin, a regional central city that had sprung up as a result of the construction Trans-Manchurian Railway by Russia, was challenged by Qiqihar and Aigun, which were "rediscovered" because of China's self-built railroads and those built by the Japanese puppet regime in Northeastern China, as well as by the newly emerging cities of Mudanjiang and Jiamusi. As a result, the regional urban system has been reconstructed again. In short, in modern time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and the continuous changes of the northeast railway network under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Japan and Russia, the balance of the urban system in the north of Northeast China was constantly broken and reconstruct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two systematic reconstruction in the Northern Area of Northeastern China in Modern Times, great changes took place correspondingly in the spatial layout, functional structure and scale structure of the regional urban system.

The Role of Frontier Transport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Northwestern 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Line LI Yanzhi, Du Jia

The present paper, reconstructing the history, in which the Nationalist Nanjing government tried to incorporate the frontier transportation into the overall national program by opening up the northwestern 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line in support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points out that this endeavor played the dual role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frontier areas and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national program of integrating the frontier.

Competitive Discourses on Sovereignty: The Sino-Japanese Negotiation regarding Japan's 1874 Aggression against Taiwan YANG Kai

The present paper, delving into competitive discourses on the issue of sovereignty in relation to Japan's aggression against Taiwan, holds that Qing's negotiation, which was against Japan's allegation that China's sovereignty should not be applied to the land of minorities (such as Taiwan) according to arbitrarily selected European international law and justified China's management of such land in light of local customs, was a derivative of European discourse on mutual recognition of sovereignty respecting dependent territory and revealed gradual changes leading to the identity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state.